

PERRY MILLER'S
STUDIES ON NEW ENGLAND
PURITANISM

佩里·米勒的 清教研究

◎ 张孟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ERRY MILLER'S
STUDIES ON NEW ENGLAND
PURITANISM

佩里·米勒的 清教研究

◎ 张孟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佩里·米勒的清教研究 / 张孟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161 - 0347 - 0

I. ①佩… II. ①张… III. ①基督教 - 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527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周 昊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40843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2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研究美国文明或者美国精神，离不开对美国清教的研究。这是因为清教思想被许多学者视为美国文明的源头。早期清教思想中的许多要素，如契约思想、理性观念、重视教育等，都成为美国文明中的关键要素。在美国，清教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但在中国，研究者寥寥，成果亦不多。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对清教思想在美国文明形成中的作用认识不足，满足于某些表象的描述，缺乏对清教历史与代表人物的深入挖掘与研究；二是研读早期美国清教的有关文献对外语的要求较高。学外语出身的研究者语言上困难不大，但缺乏历史与宗教的背景。学美国史出身的研究者，历史方面的训练扎实，但在研读英文原始文献上又困难重重。两者兼备又有兴趣研究的学者不多；三是当前学术界存在的浮躁风气和过于重视现实问题的趋向，使得这种费力气的基础研究，难以吸引有才华的年轻学子。

但是张孟媛女士的《佩里·米勒的清教研究》一书让我眼睛一亮。张孟媛女士学英语出身，又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有了我前面所讲的“两者兼备”的才能。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专家何顺果教授指导下专心研究米勒及其清教研究。她的研究遵循了“小中见大”的原则：虽是研究一个学者，却是涵盖了美国清教研究及米勒对清教思想的分析。通过对一个心智史学家关于清教研究的剖析，我们就能置身于十七八世纪的美国，对清教思想也就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由于研究的内容比较专门，引用的原始资料很多，又采用了对比分析的写法，因此，必须沉下心来去阅读。但对研究美国任何方面的学者来说，这是了解美国文明起源的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值得一读。

梅仁毅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导论	(1)
一 中美学术界对清教的研究状况	(1)
二 国内外学术界对米勒的研究状况	(22)
三 写作目的、研究方法、创新性、章节安排和材料来源	(28)
第一章 米勒与心智史学研究的兴起	(30)
一 米勒的个人经历	(30)
二 米勒的心智史学研究	(41)
三 米勒心智史学研究的缘起	(53)
第二章 清教思想体系的发现	(66)
一 清教的起源	(66)
二 17 世纪新英格兰的清教徒	(69)
三 米勒关于清教思想体系及其特点的分析	(73)
第三章 关于清教仪式和生活方式的解释	(95)
一 17 世纪清教徒的生活方式	(95)
二 延续和变化：仪式、教育和清教布道	(105)
三 清教伦理与社会交往	(113)
第四章 关于清教政治观念的分析	(119)
一 《圣经》共同体	(119)
二 “精英政治”和好的统治者形象	(123)

三 清教徒和世俗政府的关系	(129)
第五章 行省内的清教情感与美国精神	(147)
一 从殖民地到行省：转变中的新英格兰	(148)
二 清教徒的转变：从虔诚派到理性和务实	(157)
三 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爱国主义者的清教徒	(172)
结语	(189)
附录 新英格兰殖民地大事记	(202)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35)

导 论

一 中美学术界对清教的研究状况

“清教”或“清教主义”对应的英文词汇皆是“Puritanism”。该词汇在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被译为“清教徒的行为和教义；清教主义”^①，而在1955年出版的《美国文学简明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83年出版的《美国历史简明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1988年出版的国际版《大美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199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Puritanism”一词被解释为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在英国兴起的旨在消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教皇残余”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中国学者大多作广义的理解，将之翻译为“清教”，而非“清教主义”，以避免“主义”之谓导致歧见。不过，在刘绪贻、李世洞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以及一些论文，特别是学位论文中，作者们经常使用“清教主义”一词。例如，黄强：《清教主义及其留给美国的遗产》，武汉大学英语系1997级硕士学位论文；赵巍：《早期殖民地时代北美清教主义问题再探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9级硕士学位论文；王庆奖：《“哀诉”布道与美国文化》，南京大学历史系1998级博士学位论文；罗朝秀：《北美殖民地时代的清教主义及其影响》，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就美国学术界而言，学者们对“Puritanism”一词的界定迄今为止尚无一致的看法，仍然人言言殊、见仁见智。例

^① 李北达编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05页。

如,莫里森认为:“清教是一种笃信《圣经》是上帝之全部福音的生活方式,清教徒则是努力遵照此种信仰度日的英国人”^①;肯尼思·B.默多克(Kenneth B. Murdock)认为:清教的概念应该尽量“综合,不仅应包括约翰·鲁滨逊(John Robinson)、纳撒尼尔·沃德(Nathaniel Ward)、布拉德福德(Bradford)和温思罗普(Winthrop),也要涵盖巴克斯特(Baxter)、班扬(Bunyan)、弥尔顿·马弗尔(Milton Marvell), (甚至)普利茅斯分离派、马萨诸塞的独立派、公理宗、浸礼派等都要囊括在内——所有教派聚在一处,使清教构成一个思想派别……”^②;而1976年出版的7卷本《美国历史词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则写道:“在美国,‘清教’一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除罗德岛以外的新英格兰的同义词”^③。最与众不同的界定当属比利·G.史密斯(Billy G. Smith)和加里·B.纳什(Gary B. Nash)在其所编《美国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中给出的解释:“‘Puritanism’一词是一个特别难以界定的概念,学者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改革英格兰教会的一场运动、由契约神学和拉米斯(Ramist)逻辑学构成的一种思想体系、一套独特的新教原则、一场政治运动以及加尔文教会体系之中的英裔美国人一脉。有人否定这一词语的整体性,认为清教徒与英国新教徒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最好将之理解为一种主要以冗长的转化体验为核心的宗教感受力。”^④ 总体而言,当代美国史家多数主张对“清教”一词作出宽泛的理解。据此,笔者认为:清教不仅指清教徒的思想观念和组织(即教会),也应包含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清教徒活动。

清教与近代西方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清教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并未穷尽底蕴,清教依然是一个有待继续研究的课题。而它作为美国的主流文化,对

① Samuel Eliot Morrison, *Builders of The Bay Colon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8), pp. 54—55.

② Michael McGiffert, “American Puritan Studies in the 1960’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ume 27, Issue 1 (Jan., 1970), p. 45, 注释 35.

③ *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 c1976—c1978), Vol. V, p. 469.

④ Billy G. Smith & Gary B. Nash, ed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3), p. 304.

美国国民性格的塑造和早期历史演进所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法国贵族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系统地研究了美国的民主之后不禁感叹：“美国的整个命运包含在第一个踏上这片海岸的清教徒身上，就仿佛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包含在第一个身上一样。”^①美国“清教思想研究之父”^②佩里·米勒则明确指出：“它（清教）在美国思想中的角色几乎一直都是主导性的，因为清教徒的后代们至少把先辈们的思维习惯贯彻到各式各样的追求之中，把影响扩大到整个国家范围之内并在许多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③不止于此，清教已经渗入美国文化和民族的特点之中，“成为美国文化和社会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的因素”^④。美国著名文学史家范·韦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言道：“我们发现，美国精神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并行但很少汇合的主导潮流——一种是明流，另一种是暗流——两者都同样是非社会性的：一方面，超验主义的潮流起源于清教徒的虔诚，在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身上成为一种哲学，中经爱默生，产生了美国主要作家的那种过分讲究的雅致和超然态度，导致了大多数当代美国文化最终的非现实性；另一方面，一心赚钱的机会主义潮流则起源于清教徒生活的实践性转型，在富兰克林身上成为一种哲学，中经美国的幽默小说家，最终形成了我们当代商业社会中的氛围。”^⑤清教在美国文明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不对清教做一些了解，就无法了解美国”^⑥。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清教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就历史学界而言，时至今日，“清教已经成为美国历史研究中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J. P. Mayer, ed., G. Lawrence trans.,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Garden City, 1969), p. 279.

② Robert Middlekauff, "Perry Miller", in Marcus Cunliffe & Robin W. Winks, eds., *Past-masters: 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 (Conn.: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 1969), p. 189.

③ Perry Miller & Thomas H. Johnson, eds., *The American Puritans: Their Prose and Poetry* (Garden City, New York, 1956), p. ix.

④ R. Reinitz, *Tension in American Puritanism* (New York, 1970), p. 1.

⑤ Van Wyck Brooks, *America's Coming-of-Ag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Anchor, 1958; orig. ed., 1915), p. 10.

⑥ Perry Miller & Thomas H. Johnson, eds., *The Purit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3), p. ix.

最为复杂的领域”^①，“其所表现出来的精妙和成熟，很少学术领域能够具备”^②。根据国际史学和美国史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美国清教史学研究的自身特色，美国历史学界的清教研究大致可以划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 自“乡绅的业余所事”转向专业化（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末期）

虽然从北美殖民地创立伊始，就不乏记述清教徒在荒野中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历程的作品问世，但多属纪实性的描写，带有很强的“宿命论”色彩，题材主要是回忆录、圣徒的传记和编年史，撰写者也大都是清教徒神学家和政治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零星写作的《普利茅斯拓殖史》（*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和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于1702年出版的《美洲基督教史》（*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这些作品介绍了殖民地的地理、风物、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最初的殖民经历，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些文史杂糅的作品在文学上显得粗糙浮浅，缺少可读性，而且“其作者也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文学类，他们实际上并无我们可称之为‘纯文学’的感觉，所有作品不过是以其他方式实现他们在布道中所寻求的同样目的”^③；从史学的角度看，这些作品将事实和想象、政治与宗教糅合在一起，也称不上是“信史”。不过，它们保留了当时人们的“所思所为”，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作家秉承神学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神意眷顾的记录，自然界或者天国中所发生的事件即是上帝统治意愿的体现。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尤里安·奥克斯（Urian Oakes）牧师曾经告诫民众：“我们的重要职责就是充当上帝的回忆录或记录员，从而上帝的慈爱可以准确无误地留存在我们心中，被我们铭记。”^④ 据此，新英格兰的历史是“天意神佑”

① Michael McGiffert, "American Puritan Studies in the 1960'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ume 27, Issue 1 (Jan., 1970), p. 37.

② Robert Middlekauff, "Perry Miller", in Marcus Cunliffe & Robin W. Winks, eds., *Past-masters: 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 (Conn.: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 1969), p. 187.

③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9), p. 359.

④ *New England Pleaded with* (Cambridge, 1673), p. 23. in Perry Miller & Thomas H. Johnson, eds., *The Puritans*, p. 81.

所致。

18 世纪北美殖民地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是曾担任过马萨诸塞殖民地首席法官 (Chief Justice) 和总督的托马斯·哈钦森 (Thomas Hutchinson)。他主张“奉史直书”，著有 3 卷本《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和地区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Colony and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Bay*)，记述了海湾殖民地的宪政史和法律史。在书中，哈钦森强调创立者的思想在与母国的冲突、殖民地建立和宗教宽容精神的孕育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其看来，马萨诸塞殖民地最初采用的政治、法律和教会形式皆缘于建立者们依照“最合于神圣的《圣经》模式”而构建社会的“伟大设计”^①。进入 19 世纪，美国史学界的清教研究虽然从未间断，但从总体上看，还基本上是“乡绅的业余所事”^②：此时期主导美国史坛的“贵族史学家”，如乔治·班克罗夫特 (George Bancroft)、弗朗西斯·帕克曼 (Francis Parkman)、约翰·G. 帕尔弗里 (John G. Palfrey) 和理查德·希尔德雷斯 (Richard Hildreth) 等“过度派” (filiopietist) 史家都出身于新英格兰清教望族，他们对其先祖饱含崇敬之情，甚至将之奉若神明。在他们眼中，清教徒是美国人民所有美德——节俭、勤劳、诚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源泉，美国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也正是发轫于 17 世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帕尔弗里在其于 1858—1890 年撰写的 5 卷本《新英格兰历史》(*History of New England*) 中，将温思罗普等海湾殖民地的创建者描述为完美无瑕的英雄，认为：温思罗普等人为美国自治政府观念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为了捍卫这一理念，与安妮·哈钦森 (Anne Hutchinson) 之类的“破坏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③。

19 世纪末期，美国史学完成了专业化，开始由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现代的分析性史学，美国历史学界的清教研究也随之向专业化方向转变。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仍囿于早期的美国史学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框架，多探讨清教统治的民主性问题，并且基本持否定

① Robert Allen Skotheim,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New Jers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6), pp. 13—14.

② <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

③ John Gorham Palfrey, *History of New England* (Boston, 1875), Vol. IV, p. x. 转引自 Gerald N. Grob & George Athan Billias, ed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Vol. I, p. 24.

态度。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统治被指斥为“神权暴政”或“寡头统治”，与“真正”的美国传统背道而驰。早期“帝国学派”史学家赫伯特·奥斯古德（Herbert L. Osgood）言道：“马萨诸塞尽管有似乎是民主的形式，但实际上是少数人所统治的。”^① 诸如此类的批评不绝于耳，以致美国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Edmund S. Morgan）感叹：“新英格兰清教徒在如今声誉不佳……无论美国人的思想中出现了什么毛病，都要归咎于其清教先祖。”^②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史学家们对清教徒的负面看法有增无减，并逐渐成为一种“定式”。进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殖民地史研究专家托马斯·J. 沃滕贝克（Thomas J. Wertenbaker）在其作品中这样写道：“马萨诸塞建立者的布道文和出版物清楚地说明：他们从未有过将其新‘圣地’之门向持异议者敞开的想法。他们绝非‘宽容’的拥护者，而是强烈地反对‘宽容’。……300年前典型的新英格兰人或弗吉尼亚人或许对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进步贡献寥无。”^③ 此外，进步学派史学家还用经济动因来解释清教，认为：经济因素而非信仰构成了清教的驱动力。譬如，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指出：“他们（清教徒——笔者注）来到新世界的原因很简单，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④，因为“4/5的移民对迁徙领导者的宗教抱负没有特别的认同感，他们服从牧师们的统治只是为了获得自由土地和经济机会”^⑤，“‘即便是在前往马萨诸塞的成年男子中，至多也只有大约1/5的人对那里盛行的宗教观念有足够的认同感，想成为教会成员’”^⑥……1640年，在马萨诸塞增加的16000人中，有12000人主要是为‘土地’而

① H. L. Osgood,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loucester, Mass., 1957), Vol. I. p. 167.

② Edmund S. Morgan, *The Puritan Dilemma: The Story of John Winthrop*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8), p. xi.

③ Thomas J. Wertenbaker, *The First Americans, 1607—1690* (New York, 1927), pp. 90—91, 303.

④ James Truslow Adams, *The Founding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21), Chapter VI, p. 122.

⑤ 转引自 Perry Miller, *Orthodoxy in Massachusetts: 1630—1650*, p. xii.

⑥ James Truslow Adams, *The Founding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21), Chapter VI, p. 121.

来，他们都不是教会成员”^①。在亚当斯看来，清教神学与哲学主要是由清教牧师和世俗领导人所组成的中产阶层为保护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而构筑的一种观念体系，旨在将自身对下层民众的统治合理化、维持政府寡头统治形式的永久存在，正是在此理念驱动下，清教徒进行了“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沃滕贝克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记住：从一开始，许多移民就是出于经济动机而非宗教原因而移居新英格兰的。”^②

这一时期美国清教研究的另一特点是“进展迟缓”。1922年，哈罗德·斯特恩斯（Harold Stearns）编辑的《合众国文明》（*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出版，书中没有收录一篇关于宗教问题的文章，个中原因，作者解释道：“我发现没有人对这个题目感兴趣。”^③清教研究的如此“寥落”促使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1932年发出这样的感喟：“从（新英格兰历史）中获取新的成果几乎就像在新英格兰农场枯竭的土壤中生长出新庄稼一样困难。”^④在亚当斯这一派史家看来，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是一块“思想和文学的冰川”^⑤，它的“资源早已被以往的学术研究开发殆尽”^⑥。许多人甚至将清教契约神学研究等同于“出土文物”，对米勒的学术方向感到悲观，如米勒所言，“他们认为我正在做一件纯粹是研究古董的事情，觉得我可怜”^⑦。如此这般，以致20世纪50年代中期，米勒在回忆自己刚刚致力于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契约神学”研究之时，不禁感慨良多，对其密友理查德·尼布

① B. W. Bond, Jr., *The Quit-rent System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Yale Univ. Press, 1919), pp. 15, 35. in Edmund Morgan, ed., *The Founding of Massachusetts: Historians and Sources*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4), p. 49.

② Thomas J. Wertenbaker, *The First Americans: 1607—1690*, p. 111.

③ Harold Stearns, ed., *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2), pp. v—vi. 转引自 Henry F. May, “The Recovery of American Religious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0, Issue 1 (Oct., 1964), p. 82.

④ *Nation*, CXXXI (1930), p. 20. 转引自 Michael McGiffert, “American Puritan Studies in the 1960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27, Issue 1 (Jan., 1970), p. 36.

⑤ John A. Garryaty & Mark C. Carnes, eds.,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Vol. 15, p. 511.

⑥ Alpert J. Gelpi, “Perry Miller: 1905—1963”, *The Harvard Review* (Winter—Spring 1964), Vol. II, No. 2, p. 5.

⑦ John Crowell & Stanford J. Searl, Jr., eds., *The Responsibility of Mind in a Civilization of Machines: Essays by Perry Miller*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9), p. 137.

尔 (Richard Niebuhr) 的理解和支持充满了感激之情。

亚当斯等人的论调与当时美国思想史与宗教史研究的相对“萧条”状态密切相关。1927年,弗农·L. 帕林顿撰写的《美国思想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一书前两卷出版,并藉之获得了历史学科的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但是,在所有历史类的出版物当中,只有其家乡无名的历史机构对其中一卷予以点评。晚至1934年,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在准备的书目中,仍将“历史”一词的含义界定为政治、宪政、法律和经济史。^①对此,米勒不无感触道: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问题,不是历史学家们拒绝承认人类行为能够为其思想所左右,而是他们根本不懂“思想”。……“当时的学术研究状态是如此地令人沮丧”,以至于在讨论清教徒的政治与社会理想时,历史学家们“明显地暴露出他们不懂这样一些事情”,譬如,路德教义与加尔文主义的区别或是马萨诸塞与康涅狄格的区别。^②

二 取得实质性突破阶段(20世纪30—5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美国思想史研究虽然在20年代还处于“低谷”状态,但是,一些侧重研究思想的史家已经开始怀疑前辈史家在未理解清教徒政治和制度背后的“思想”的历史的情况下,对清教徒政府、教会以及学校等机制的作用所作出的评价是否恰当。他们认为:研究清教徒的思想对于理解和评价清教至关重要。20世纪30年代,随着美国的民主自由传统受到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兴起的极权主义的挑战,史学家们愈发意识到肯定其传统价值的必要性,开始重新审视清教在美国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在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美国史学界的清教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史学家的研究内容触及了清教史学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清教的内涵、清教与新英格兰殖民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清教在早期美国历史传统乃至美国文明中的地位以及“新英格兰精神”的实质等问题,代表人物当推哈佛大学英语系

^① “List of Research Projects in History Exclusiv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w in Pro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ominion of Canad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Supplement (April, 1934), p. 3. 转引自 John Higham, “The Ris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56, Issue 3 (Apr., 1951), p. 462.

^② Perry Miller,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p. 16.

美国文学教授肯尼思·默多克 (Kenneth Murdock)、佩里·米勒和历史学教授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这些哈佛学者不仅对 20 年代普遍的“反清教”(anti-Puritan) 论调给予了尖锐批驳,而且打破了已往史家侧重新英格兰殖民地政治史、制度史考察的传统框架,着眼于清教徒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从而推动清教乃至整个美国宗教史研究全面复兴。1927 年,默多克的博士论文《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付梓。在“序言”中,默多克称赞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作品“令人鼓舞、有所裨益”^①,但是,他并未解析清教徒“迁徙”背后潜藏的经济动机,而是对主人公及其所体现的清教文化给予了热切的同情和赞赏,向读者表明了严肃看待清教徒思想的重要价值。莫里森如默多克一样,也为清教徒对待神学观念和思想生活的严肃态度所吸引,他首先驳斥了亚当斯等人对清教的经济解释,认为“宗教而非经济或政治是清教徒对英格兰不满及迁徙到新英格兰的源头”^②,进而将默多克的见解拓展和深化,指出:清教思想是早期新英格兰历史中最重要的因素,正是清教促使新英格兰人在早期不利的条件下获得成功。对于 17 世纪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既没有充分认识,又未完全理解之处在于:清教不仅没有阻止,而且刺激了在经典、纯文学、诗歌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兴趣。开拓者的艰难与其他限制都没有强大到阻止在荒野边缘的一系列小据点——即 17 世纪新英格兰——的真正的思想生活的发展。”^③ 1930 年,为纪念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 300 周年,莫里森创作了《海湾殖民地的建立者》(*Builders of the Bay Colony*)一书。在该书“序言”中,莫里森坦承自己对 17 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强烈兴趣和尊敬,认为他们是“有胆识的、仁慈的、勇敢的和意义重大”的人^④。在书中,莫里森选取了在海湾殖民地初建的 50 年中社会生活各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① 转引自 Edmund Morgan, “The Historians of New England”, in Ray Allen Billington, e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Edwin Pomfret* (San Marino, Calif., 1966), p. 49.

② Samuel Eliot Morrison, *Builders of The Bay Colony*, p. 386.

③ Samuel Eliot Morris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 1956), p. 4. 转引自 Robert Allen Skotheim, “The Writing of American Histories of Ideas: Two Traditions in the XXTH Century”, *Journa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ume 25, Issue2 (Apr.—Jun., 1964), p. 272.

④ Samuel Eliot Morrison, *Builders of The Bay Colony*, p. vi.

对他们的家世背景、迁徙经历、思想观念以及异乡生活等进行了扼要的叙述与分析,批驳了亚当斯等人所持的偏颇观点,论证了清教徒性情中的“闪亮”一面,宣称:“这样的清教徒除了热衷神学之外,是能够通过20世纪的‘检阅’的”^①。不过,莫里森对清教研究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分析清教本身的内容和结构,而在于激发了学者们对殖民地时期各类思想活动的考察。当时正在莫里森和默多克指导下写作博士论文的佩里·米勒(1905—1963)深受鼓舞,潜心于清教思想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系统地分析了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内在的思想体系,为美国学术界的清教研究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标志着美国清教研究的决定性转折”^②。笔者将在后文予以详细解说。

三 繁荣与深入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更多学者投入到清教研究中来,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清教研究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其成果之一便是1966年《早期美国文学》(*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杂志的创刊。该刊物是推进美国清教研究的最重要期刊之一,标志着美国史学界的清教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具体表现为如下三方面:

第一,大量记述清教徒活动的原始文献编纂、出版。^③

第二,新社会史学家取代思想史学家成为清教研究的主体,研究对象也从已往的清教徒“精英”转变为普通的移民家庭、社群和村镇。该派史学家选取迥异于思想史学家兴趣所及的原始资料,如私人

① Robert Middlekauff, “Perry Miller”, in Marcus Cunliffe & Robin W. Winks, eds., *Past-masters: 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 (Conn.: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 1969), p. 172.

② Michael Ryan McCoy, “In Defense of the Covenant: The Sacramental Debates of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Puritanism)”, Ph. D dissertation (Emory University, 1986), p. 4.

③ 代表作品如: Perry Mill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Roger Williams* (New York, 1963), Reprinted; Bernard Bailyn, ed., *The Apologia of Robert Keayne* (New York, 1964); Edmund S. Morgan, *The Founding of Massachusetts: Historians and the Sources* (Indianapolis, 1964), *Puritan Political Ideas, 1558—1775* (Indianapolis, 1965); *The Diary of Michael Wigglesworth, 1653—1657* (New York, 1965); David D. Hall, ed., *Puritan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New York, 1968), *The Antinomian Controversy, 1636—1638: A Documentary History* (Middletown, Conn., 1968); Sydney V. James, ed., *The New England Puritans* (New York, 1968); Larzer Ziff, *John Cotton On the Churches of New England* (Cambridge, Mass., 1968); A. W. Plumstead, ed., *The Wall and the Garden: Selected Massachusetts Election Sermons, 1670—1775* (Minneapolis, 1968); Michael McGiffert, ed., *Puritanism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Reading, Mass., 1969)。

档案、税收簿、教会账本、墓地记录、清教徒在英国的出生、受洗、结婚和死亡记录，采用人口统计学和计量的方法，重新考察了清教思想与清教徒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民众参与及影响地方政治的程度以及教会与新英格兰政府的关系、土地制度和财富分配等问题，得出了一些客观结论。例如，曾担任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专业主任的斯蒂芬·西恩斯特罗姆（Stephan Thernstrom）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19th-century City*）一书中，采用计量方法分析了马萨诸塞州纽贝里港（Newberry）1870—1945年的财政档案、房租册、人口登记册、税收收据等大量原始资料和数据后，认为：美国社会在工业化时期，蓝领、白领阶层变动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即工人阶级的社会流动性只存在于内部，而不存在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萨姆纳·奇尔顿·鲍维尔（Sumner Chilton Powell）的《清教徒村庄：一个新英格兰村镇的形成》（*Puritan Villag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England Town*）和肯尼思·A. 洛克里奇（Kenneth A. Lockridge）的《一个新英格兰村镇的最初100年：马萨诸塞的戴德姆，1636—1736年》（*A New England Town,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Dedham, Massachusetts, 1636—1736*）两部著作，虽然结论相反，但均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鲍维尔特别强调新英格兰村镇制度形成的独特性，认为这一体制是英国的地方制度在新世界的简陋条件下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结果，其最终形式是全新的、美国式的；而洛克里奇采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通过对戴德姆村镇居民社会流动性和财富分配细目表等原始记录的计量分析，断言以戴德姆为代表的新英格兰村镇的形成具有双重涵义：从其起源看，戴德姆与其他村镇一样，是英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一个农业群体，其基本特性与整个欧洲的村庄并无二致；但从另一层面上理解，即就其作为荒野中的一个定居地和为理想而战的英国清教徒的避难所而言，戴德姆独具美国特性。新社会史学家所进行的个案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清教研究的主题，丰富了思想史学家所长期探讨的“美国精神”（*American Mind*）的内涵，以致埃德蒙·摩根在1966年断言：“我们对于清教徒的了解比任何有头脑的人